

从 专 卖 到 公 营

——荷印殖民政府鸦片经营策略的转变及其对爪哇华人社会的影响

沈燕清

(厦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荷兰殖民政府曾先后在鸦片经营上实行专卖包税制度和公营局制度。这两种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分别对爪哇的华人社会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荷印殖民政府 鸦片包税制度 鸦片公营局制度 爪哇 华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34.3.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9)04-0023-06

一、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度下的爪哇华人社会

一般认为鸦片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输入爪哇的,当荷兰人在 16 世纪后期出现在爪哇海岸时,鸦片已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重要物品,也是华侨和广大爪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最初鸦片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专营的,从 1619~1799 年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输入 56 吨天然鸦片到爪哇,此后的荷印殖民政府也大力从事鸦片交易,到 19 世纪初鸦片已经在爪哇各地广泛行销^[2]。

所谓的包税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征税的方法,它包括在一定期限内租让收税的权力或销售由政府垄断的诸如鸦片或盐之类的物品。鸦片包税制就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内获取(购买)政

府垄断控制的鸦片的权力,该制度曾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里存在^[3]。1809 年,总督丹德尔斯(Marshal Daendels)(1808~1811)正式建立鸦片包税制,在该制度下,商人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获得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制造鸦片与征收鸦片税的承包权。政府从承包者手中收集税收,也从承包商出售鸦片中获利,因为鸦片的进口是由政府垄断的。此后,鸦片包税制不断得到完善,1830 年代在全岛实行(除了勃良安和万丹地区外),到 1860 年代成为荷印殖民地主要的经济制度,在强迫种植制结束后的经济扩展的年份里,鸦片包税制发展到成熟,其影响也达到最大^[4]。

华侨一直是荷印时期鸦片包税的主体。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侨是唯一的有组织、技能和资本来运作大税收项目的人”^[5]。著名学者

[收稿日期] 2009-10-10

[作者简介] 沈燕清(1975-),女,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在职博士生,主要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

Anthony Reid 曾指出,包税制看起来是作为华侨与荷兰之间新经济合作的一部分而在 17 世纪被介绍到东南亚,对希望事先获得税收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有不断增长的对国家税收的需要但缺少收税的现代方式,他们不愿意或者同化于华侨商业精英或直接卷入税收事务,税收承包制为他们提供了方便^[6]。所以,由华侨承包鸦片包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为荷兰殖民者所欢迎的。

鸦片包税制度的实行对荷兰的殖民财政做出重要贡献^[7],同时也对印尼华侨社会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作用。

一方面,鸦片包税制度是华侨深入爪哇农村进行资本早期积累的重要途径。须山卓教授曾有如下这样的论述:“荷兰当局在中国人当中挑选一些重要人物,让他们担任一般的商业管理和征税活动,也就是通过授予特权待遇使其成为荷兰人的合作者。得到这种特权地位的中国人进一步利用了这种垄断的中介作用来取得利益,有时并勾结当地原住民社会的封建势力,加强他们对当地农民的不等价交换,以取得更高的超额利润,逐渐强化了他们依附荷兰商业资本的买办性……在经济活动方面,他们(指华侨)则依靠当时的买办商业活动来积累资本,创造出了能够使自己形成相对富裕阶层的机会,这便是在所谓金字塔阶层社会内部,在一方是荷兰人当权者和另一方是当地原住民之间形成出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的原因。”而通过这种方式为荷兰人的殖民地经营提供协助的华侨,好象寻觅“狮子口下的残羹”似地积累起了“买办的”资本^[8]。可以说,鸦片包税制度为华侨早期资本的积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它在爪哇的社会生活中塑造了华侨社会的最高阶层“Cabang Atas”。Cabang Atas 指的是华人鸦片包税者及其家庭和商业伙伴,他们是华侨中最富有的和最成功的群体。Cabang Atas 的出现与荷兰殖民者将华人官员制度(即甲必丹制度)和包税制度结合起来推行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学者 Mona Lohanda 直接地指出吧城“华人甲必丹的责任直接与商业行为挂钩,特别是殖民财政基础赖以建立的税收承包”^[9]。“既然财富是官职的最基本标准,因此官位仅对那些有特定经济位置的人开放,即显赫的商人和土地所有者”^[10]。因为甲必丹不领薪水,所以在荷印殖民政府推行的各种税收承包制中,华侨承包商尤其是甲必丹、雷珍

兰、玛腰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少侨领积极利用其与荷兰殖民政府的关系和职务来取得某些税收及专卖承包权,鸦片包税也不例外。

身兼包税者与华人官员身份的华侨精英在华人社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控制着爪哇华人社会与荷兰殖民政府交往的每个方面。他们是殖民地法规 and 政策的解释者和执行者……大城镇中华人官员所在的华人公馆(the council)通常有一个独立的警卫力量,且与爪哇当局合作追捕对政府税收和垄断的冒犯者。在这种追捕中,华人官员被授权检查库房、商店、仓库、住宅及华人和其他非欧洲嫌疑犯的其他财产。此外,华人官员长期负责民事纠纷仲裁,每周六在殖民地法院所有涉及华人的案件中正式担任顾问。”^[11]“Cabang Atas 的财富和权力从根本上来源于他们对几乎统治着爪哇所有非欧洲人的经济行为的巨大而具有竞争性的华人商业网络的控制……持有鸦片包税权使得这些网络的领导者在广大地区的,经常是整个驻扎区,商业活动中处于一个统治的位置。”^[12]。

因此,可以说,“殖民政府的这项经济和税收政策(指华侨包税制度,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鸦片包税制度),对土生华人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化影响极大……土生华人上流社会……由华人官员或上层人物组成。财富是出任玛腰、甲必丹和雷珍兰的条件……财富也是土生华人成为征税(包税)人的条件,而华人官员和包税人则往往为同一人。自从 18 世纪末期以来,包税人和华人官员职位,倾向于具有世袭的性质,并且局限于少数土生华人家族。”^[13]“通过作为包税人的地位和拥有进行贸易垄断的机会,土生华人家族得以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从而使他们能够保持作为上流成员的地位。”^[14]

二、从专卖到公营——荷兰殖民政府鸦片经营策略的转变

整个 19 世纪,鸦片专卖税收承包为荷兰殖民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19 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19 世纪末爪哇的鸦片包税制度遭遇了意想不到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败^[15]。从 1870~1880 年代开始,爪哇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咖啡和蔗糖的种植先后遭遇病虫害,口蹄疫也袭击了爪

哇的牲畜养殖,糖与咖啡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下降,等等^[16]。所有这些都对爪哇的鸦片包税制起了破坏性影响,许多鸦片包税者因此无法缴纳他们应交给政府的款项,这就导致了殖民政府收入的下降^[17]。到1889年承包合同末期,爪哇的19个鸦片包税机构中只有四个侥幸存活,其它几个机构的累计债务达到数以百万计的荷兰盾,很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包税者加入破产者的行列而锒铛入狱。由于包税者无法支付应付款项,殖民政府的税入自然就减少了,殖民当权者本身也开始对包税制度不满。

因此,19世纪中后期在爪哇社会乃至荷兰本土都渐渐掀起了一股反鸦片包税制的运动。最初对鸦片包税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改革鸦片经营制度及遏制鸦片走私上,此外,鸦片的上瘾性及其对人体健康与公众福利的潜在的不利影响也引起人民的关注。随后,舆论批评焦点就指向了鸦片专卖制度本身,一些荷兰殖民者认为:“鸦片专卖者代表了‘主权中的主权’,它蔑视有效的监督并触犯法律,而且他们的权利与财富腐蚀了殖民统治制度,无论是本地的行政机构、低级法院,甚至欧洲的殖民服务机构都无法幸免”^[18]。1887年殖民官员布鲁索夫(Brooshooft)签署了一份由1255个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给12位首要的荷兰政府官员,同时附上了一份《东印度事务情况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Indies*)。该备忘录对反鸦片包税制情感的演进起了极大冲击作用,因为“它比其它的对鸦片包税制的批评更具体、更有依据、更权威”、“成为被最广泛援引的包税制的罪状之一”^[19]。1889年在荷兰成立了一个反鸦片联盟,1890年该组织在海牙出版了活动年报《爪哇的鸦片诅咒》(即 *The Opium Curse in Java*),它被认为是“提出了至今最为全面且细致的反包税制的申述”^[20]。这场反鸦片包税制运动得到爪哇的欧洲种植园主和商业界及荷兰本国人的支持。随着证据的积累和意见的融合,人们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即“荷兰殖民地的鸦片政策是站不住脚的”^[21]。

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进入所谓的“伦理政策”(The Ethical Policy)时期。“伦理政策”,又译为“道义政策”,它是自由主义殖民政策的结果和荷兰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伦理政策,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在政治上实行分权,还权于印尼人民,在经济上扶植印尼

本土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发展印尼的教育、卫生事业^[22]。虽然,一些学者曾尖锐地指出伦理政策实质上仅是荷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使殖民政策适应于自己殖民统治的需要而披上伦理(道义)政治的外衣,但它的出台对鸦片包税制起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当殖民政府感觉必须通过声称他们是为了本地人的福利而工作来为他们的存在寻找合理依据时,他们很难解释鸦片包税制的存在”^[23]。因此,结束鸦片包税制,就自然成为“伦理政策”的一部分^[24]。

但是,在爪哇地区,“大规模的鸦片消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成为现实。”^[25]因此,在爪哇短期实现对鸦片的完全禁绝是不现实的,因此人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设想一种能够消除与鸦片包税制相关弊端的新的鸦片分配体制,1880年代法国在印支所实施的鸦片公营专卖局制度(*Opium Regie*)给了荷兰殖民者极大的启示。1881年,Levysohn Norman在下议院中提出要在爪哇建立类似法属印支的公营局,该提议得到上议院Van der Oye的支持。此后,殖民地部长Keuchenius W.P.Groeneveldt前往印度支那彻底研究法国的公营局,并于1890年的8月份提交了一份关于荷属印度鸦片公营局的设计报告,Groeneveldt的设计报告描绘了公营局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前景,并对殖民政府最终采纳公营局制度起重要作用^[26]。此后,总督Pi-jnacker Hordij正式提出在爪哇和马都拉建立鸦片公营局,1894年9月首先在马都拉试行公营局。在1896年1月鸦片公营局制度进入东爪哇的三个驻扎区,1903年为止推行到整个爪哇地区,到1914年,该制度推广到荷属东印度全境,华侨承包经营鸦片税收的历史就此结束^[27]。

三、鸦片公营局的特征分析及其对爪哇华人社会的影响

鸦片公营局(*Opium Regie*)是对以往的鸦片加工和销售体制的一个全面改造,是荷印殖民政府实行的对鸦片的加工、分配和销售进行中央集权的一种制度。与主要由华人掌控的鸦片包税制度相比,它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政府的垄断性^[28]。

首先,政府在吧城建立唯一的中央工厂取代当地的鸦片包税机构和次级包税机构的小工厂。这个工厂生产统一质量和口味的鸦片产品,以此

来消除掺假问题。第一个这样的工厂建立于 1893 年,1901 年因鸦片公营局范围的扩展而被一个更大的工厂取代。除了供应给在巴达维亚的政府工厂的生鸦片外,政府严格控制鸦片的进口。其次,当地私人运作的鸦片包税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爪哇地方官僚取代。再次,鸦片加工与分配的协调处于财政部下属一个中央局(a central bureau)的监督之下。而鸦片公营局在每个驻扎区的具体运作如下:每个殖民驻扎区配有一个由欧洲人管理的鸦片中心仓库和一个广泛的合法鸦片商店网络。这些鸦片商店由一个印尼人“Mantri”^①负责鸦片的销售管理,他对本地零售贸易完全负责。销售 Mantri 从中心仓库获得鸦片,出售给他们的客户,根据鸦片交易的产品类型及比例来记录他们每天的交易,并把他们的现金收益交给一个本土的副收集官(assistant collector),副收集官是鸦片公营局下最高级别的土著雇员,并担任 Mantri 与荷兰仓库管理人之间的中介^[29]。在鸦片商店之下每个驻扎区还包括一个持牌鸦片窝点(dens)网络(荷兰人称呼其为“消费中心”[verbruik plaatsen])。吸食者在公营局下的商店购买他们的鸦片后到这些鸦片窝点吸食。鸦片窝点的持有人通过出租吸烟用具,提供 awar-awar^② 树叶和其他调味品,以与公营局工厂生产的 candu 混合,并通过出售从在他们的窝点吸食的烟枪的管道中刮掉的 jicing^③ 卖回给鸦片公营局等来牟利。

由此可见,“鸦片公营局实际上就是以一個利润丰厚的和更强大的政府企业替代一个已经相当强大的华人企业”^[30]。因此,鸦片公营局制度的推行必然给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一方面,它沉重地打击了对包税制度严重依赖的华人经济。因为包税制度的消亡不仅意味着华人被从当地的鸦片贸易及其庞大的利润中排挤

出去,而且,鸦片包税者失去了他们对爪哇农村市场的进入^[31]。此后,荷兰殖民政府又推行通行证制度(1897)和居住区条例(1900)严格限制华人的流动与居住,推行这些条例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那些依赖于爪哇农村市场的华人企业失败的浪潮^[32]。这些破产反映了曾与鸦片包税制度如此紧密关联的华人商业网络的崩溃,曾经在殖民地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 Cabang Atas 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荣耀。但是,如上文所述及,华侨通过包税制度积累了相当的资本,由于在鸦片经营上的投资受限,于是华人的资本开始转向其它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中介贸易上,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33]。此外,华人也在农业、工业、手工业、矿业、金融业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投资,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华侨资本有了较大的增长且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趋势,华人民族主义工业有了一定发展。

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华人精英逐渐失去了以往显赫的地位,爪哇本土人的影响却日益提升。

在逐渐将华人排挤出鸦片事务的同时,鸦片公营局却为越来越多的爪哇人提供了一个进入政府服务部门工作的机会。鸦片公营局制度极大地扩展了 Pangreh Praja^④ 群体,它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pryayi^⑤ 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鸦片公营局提供的职位大体等同于 pangreh Praja 的助理 wedana^⑥ 及更低的职衔,包括助理收税官、销售 mantri、佣工及警卫 mantris。这些职位通常由低级别的 pryayi 填充,最初他们大多是在当地有影响的 pryayi 的推荐的基础上选出的,一旦被聘用,这些爪哇员工在政府部门随后的升迁并不局限于公营局内部。荷兰人更为果断行使其在任用、晋升、降级事项中的职权。而这些印尼本土雇员的晋升或降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表现^[34]。因此,“年轻的印

①②一种较低级的印尼本土官衔,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8.

③从鸦片枪管中刮出来的鸦片渣,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8.

④即指爪哇本土行政官员体系,包括 bupati(指王公等最高级别的本土行政官员)和他们的下属。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8.

⑤指爪哇精英、本土官员和他们的文化,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8.

⑥直接服从于 bupati 的本土官员;助理 wedana 是爪哇本土最低级别的行政官员,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9.

尼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自己给荷兰人当学徒,通过进入荷兰人的学校,适应他们的价值观。学生、副职员,及公营局的帮工构成新的 magang^①群体,他们是那些坐在受人尊敬的本地官员的膝下学习世界上被接受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变异,通过其掌握必要的技能,为自己在政府内部的职位作准备的人^②。“鸦片公营局中爪哇雇员的位置说明了在 pangreh Praja 和荷兰行政管理中重要的体制变化。Pangreh Praja 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响应政府目标的社会组织,因此就有了‘政府的 pryayi’的绰号”^③。

与此同时,印尼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 世纪末以后荷兰殖民政府在印尼实行所谓的“自由政策”,先后颁布了土地法和糖业法,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随着西方私人资本的投资,印尼商业性农业、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业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为印尼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35]。在荷印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印尼民族资本与华侨资本有很强的相似性。相同的经济地位往往意味着竞争的存在,特别是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华人的蜡染花裙业和土卷烟业逐渐兴盛和发展起来,这些原来由当地人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也逐步被华人取而代之。如“……1892 年的调查表明,花裙工业以进口布料代替当地布料作原料(向中国商人购买)使得整个花裙工业转为中国商人所控制。”^[36]而花裙业一直是印尼的传统民族工业,其优势地位的丧失,促使振兴蜡染花布业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捍卫民族地位的一种象征,20 世纪初蜡染花布业成为推动爪哇民族主义萌芽的一个催化剂。

此外,由于荷兰殖民此时期在印尼实行旨在改善印尼本土人生活状况、提升印尼人社会地位的“伦理政策”,印尼人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1905 年为抵制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渗透,一些爪哇阿拉伯人和苏门答腊人在雅加达成立了“至善社(Jam Yat Khair)”,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推动穆斯林之间的商业合作以抵制华人资本主义的扩张以保护当地民

族工业。1908 年 5 月“崇知社”(Budi Utomo)在雅加达建立,其宗旨是在爪哇和马都拉地区发展爪哇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鼓励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该组织被认为时印尼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此后,1909 年“伊斯兰商业联盟”(Dagang)乃至其后的“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的建立与领导,使得印尼民族主义情绪高涨^[37]。

随着印尼本土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勃兴,华人作为殖民者所谓的“爪哇人民的吸血鬼”^[38],日益受到印尼本土人仇恨与歧视,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 20 世纪初印尼排华运动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2][3]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 26-27 26.
- [4]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4-25.
- [5] John Butcher, *Revenue Farming and the Changing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Great Britai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 24.
- [6] Anthony Reid, *The Origins of Revenue Farming in Southeast Asia*,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Great Britai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p. 78-79.
- [7] 沈燕清.19 世纪爪哇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度研究[J].南洋问题研究,2006 (4).
- [8] [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M].郭梁、金永勋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62-163.
- [9] Mona Lohanda, *The Kapitan Cina of Batavia 1837-1942*, Indonesia : Djambatan, Member of IKAPI 2001 p.67.
- [10][11]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 Revenue*

①②③为了在 Pangreh Praja 体系中谋一职位的年轻爪哇人,通常是 pryayi 官员的不付薪的助手,见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8, p.226 225-226.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 233 ,87.

[12]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 83.

[13][14] 王福涵.荷属东印度的华人资本主义[J].周南京译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2(2) :P27-28 28-29 页。

[15][16]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182-183 ,180.

[17] Siddharth Chandra ,*What the Number Really Tell us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Opium Regie , Indonesia* ,vol. 70 , (2000) pp.101-102.

[18][19][20][21]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 198 205 206 206.

[22] 黄焕宗 ,上揭文 ,54-55.

[23] Carl A.Trocki , *Opium ,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 ,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9.p.150.

[24] Onghokham ,*The thugs , the curtain thief , and the sugar lord : power ,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Java* , Jakarta :Metafor Publishing , 2003 p.217.

[25] Eric.W.van Luijk and Jan C.van Ours , *How To Control Drugs : The lessons from the 'opiumregie'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894-1940)* , Amsterdam :Vrije Universiteit , June 1993 , Research Memorandum 1993-30 pp.4-5.

[26]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208-210.

[27][28] Siddharth Chandra , *What The Numbers Really Tell Us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Opium Regie Indonesia* , Vol.70 ,Oct 2000 , p.103 ,119.

[29]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220-221.

[30] Siddharth Chandra ,*What the Number Really Tell us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Opium Regie , Indonesia* vol. 70 , (2000) p.103.

[31][32]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242-243 243

[33] W·J·凯特.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M].王云翔、蔡寿康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106.

[34] James R. Rush , *Opium To Java :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 223-224.

[35] 汪慕恒.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工业和华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 (1) :44-46.

[36] 汪慕恒 ,上揭文 ,106-107.

[37] 施雪琴.20 世纪初初期爪哇排华运动探析[J].南洋问题研究 ,2006 (3) :84-85.

[38] Mona Lohanda ,*Growing Pains ; The Chinese and the Dutch in Colonial java ,1890-1942* ,Yayasan Cipta Loka Caraka, 2002,pp.22-23.

订 正

本刊 2009 年第三期因校对不严，订正如下：

一、第 3 页 右栏倒数第二行，“全方全”应为“全方位”；

二、同页地脚，“2008-04-03”应为“2009-04-03”；

三、同页地脚，“向大有（1932-）”，应为“向大有（1932-）”

四、同页地脚，“顾顺”应为“顾问”；

五、第 4 页 右栏倒数第一行，“不得存此薄彼”应为“不得厚此薄彼”；

六、第 5 页 左栏第 16 行，“有在量度”应为“有的在量度”；

七、同页 左栏倒数第三行，“归侨侨春”应为“归侨侨眷”；

八、第 5 页 右栏倒数第二行，“主动机”应为“主动权”。

特向作者、读者致歉！

《八桂侨刊》编辑部

2009-12